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及後期對查核期間與客戶盈餘管理之影響

林純央* 林孝倫**

摘要：本文探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及後期對於會計師查核期間與受查客戶盈餘管理程度的影響。查核期間的分析結果顯示，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其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長，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查核期間並未與疫情前 2018 年有顯著差異，而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短。另一方面，未設有海外子公司的企業，其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與 2018 年並無顯著差異，疫情後期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反而顯著較 2018 年短。盈餘管理的分析結果顯示，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其疫情初期 2019 年及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裁決性應計數顯著較 2018 年上升，而疫情後期 2021 年年報裁決性應計數並未與 2018 年有顯著差異。另一方面，未設有海外子公司的企業，其疫情初期 2019 年及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裁決性應計數與 2018 年並無顯著差異，疫情後期 2021 年年報裁決性應計數反而顯著較 2018 年下降。實證結果顯示疫情爆發初期確實造成設有海外子公司之查核工作受限而對財務報表之及時性及企業盈餘管理程度有負面影響，然而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該影響於後續期間已不復見。此結果可供主管機關與會計師界參考。

關鍵詞：新冠肺炎、查核期間、盈餘管理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際商務系副教授

**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通訊作者，E-mail：hllin@mail.ntpu.edu.tw）

111 年 05 月收稿

112 年 06 月接受

四審接受

DOI: 10.6675/JCA.202405_25(1).01

The Effect of Early and Late COVID-19 Crisis Period on Audit Timelag and Firms' Earnings Management

Chun-Yang Lin* Hsiao-Lun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arly and late COVID-19 crisis periods on audit report timelag and firms'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for companies with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 audit report dates in 2019 are significantly later than those in 2018,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melag of audit reports between 2020 and 2018. Furthermore, the audit report dates in 2021 are significantly earlier than those in 2018 for these companies. Conversely, for companies without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imelag of audit reports between 2019 and 2018. Additionally, the timelag of audit reports in 2021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2018 for these companies. The analysi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rom 2018 to 2019 and 2020 for companies with foreign subsidiarie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between 2021 and 2018. Conversely, for companies without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between 2018 and 2019 or 2020.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rom 2018 to 2021 for these companie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nies with foreign subsidiaries have longer audit timelag and a higher level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early COVID-19 crisis period. However, these firms experience a shorter audit lag and engage in less earnings management after audit firms develop new audit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COVID-19-imposed disruptions of audit process and practices in the late COVID-19 crisis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auditing practices.

Keywords: COVID-19, timelag, earnings managem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llin@mail.ntpu.edu.tw)

Submitted May 2022

Accepted June 2023

After 4 rounds of review

DOI: 10.6675/JCA.202405_25(1).01

壹、前言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以下簡稱新冠肺炎) 疫情在中國爆發，2020 年起於全球廣泛蔓延，2020 年 1 月中，臺灣出現首位確診者¹，同年 1 月底疫情迅速擴散，臺灣、香港、澳門、日本、韓國、新加坡、澳洲、馬來西亞、美國、法國、英國、義大利等地區都出現確診病例²，隨著病毒變異，截至 2022 年中為止，仍對全球企業營運與人民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臺灣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³，依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由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換言之，會計師需於年度結束前到次年三月底前完成審計工作。會計師執行審計工作，時常需要到客戶營運處所進行內部控制作業的觀察、重新執行客戶作業、檢視相關文件資訊、觀察資產存在與否並進行資產的重新計算與抽盤等。若受查客戶設有海外子公司，各國因防堵疫情而進行之邊境管制將提高會計師跨境查核的困難度，許多企業受疫情與各國政府之規定，採居家辦公制度，也可能提升查核人員執行詢問受查客戶、檢視文件等查核程序的複雜度。即使受查客戶並未有海外子公司，亦可能存在海外的交易對象，若其海外交易對象受封城封廠影響，查核人員可能無法進行應收帳款之函證等程序，增加查核人員審計之挑戰。

會計師事務所面臨過往查核方式受到各國邊境管制與封廠封城的影響，需轉換查核方式，以替代查核程序或以視訊方式取得不同型態的查核證據。臺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 亦於 2020 年公布 1090360805 號函⁴，說明當查核人員無法親赴其他國家現場執行審計工作，導致無法執行檢查原始文件或執行觀察之情況，或因警戒封城，導致無法親送函證或函證用印及函證往返時間大幅延長等情況，而無法於查核報告日前取得函證之正本回函時，可透過遠端視訊、電子郵件及傳真等方式所提供之紀錄及文件作為替代性查核證據。

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以下簡稱證期局) 在 2020 年 3 月，發出新聞稿說明若企業因疫情無法如期公告申報 2019 年財報，應向證期局申請延期，並發佈重大訊息公告。唯臺灣上市櫃公司中，僅有東森 (2614)、如興 (4414)、光麗-KY (6431)、勝悅-KY (1340)、太設 (2506) 及大略-KY (4804) 等公司申請延期公告⁵，其餘公司都順利在法定期間內完成年度財務報告之公告申報，亦即代表絕大多數會計師都順利完成查核工作。儘管如此，查核過程中是否受到疫情影響而延遲財務報表之公布，因而降低財務報表之及時性 (timeliness)，以及企業盈餘管理程度是否因為採用與過往不同的查核方式而有所差異，國內學術期刊都尚未有文獻討論。

¹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6oHuoqzW9e_onW0AaMEemg?typeid=9。

²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feb-2020-news-updates-covid19/>。

³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001>。

⁴ <https://www.roccpa.org.tw/Content/Files/userfiles/files/1090360805.pdf>。

⁵ 係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的重大訊息主旨全文檢索，以延期公告關鍵字搜尋 109 全年度之上市櫃公司得出的結果。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51sb10_q1。

本文針對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響的三個財務報告年度（2019 年至 2021 年）進行分析，首先探討審計工作之查核期間是否受疫情影響而延長。實證結果顯示，平均而言，臺灣全體上市櫃公司，疫情初期 2019 年財務報表查核期間顯著較疫情前 2018 年為長。本文進一步推論，由於 2019 至 2021 年年報的查核期間，臺灣地區的疫情警戒多維持在二級，並未有嚴格的封廠封城限制，因此國內企業之年報查核所受影響應不重大。相對的，若國內上市櫃公司為跨國企業，在海外設有子公司時，邊境管制應會影響審計工作的執行。實證模型結果顯示，對於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長，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查核期間並未與 2018 年有顯著差異，而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短。代表事務所進行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查核時，在疫情爆發之初確實因為查核風險提高及跨境查核困難而使查核期間延長，但經過一年的適應，在疫情後期 2020 年及 2021 年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時，查核期間未因疫情顯著延長。而對於未設有海外子公司的客戶而言，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與 2018 年並無顯著差異，而疫情後期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反而顯著較 2018 年短。代表事務所在進行本土企業之查核時並未顯著受到疫情影響而面臨查核困難，甚至可能在疫情下發展出不同的查核策略，進而縮短查核期間，突顯出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方式的改變，不僅影響跨國企業之查核，成效也存在蔓延效果（contagion effect），年報查核受疫情影響較小的本土企業，其查核時間也因此縮短。綜上所述，新冠肺炎蔓延初期僅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財務報表查核期間因疫情影響而延長，但隨著會計師事務所遠距查核經驗的累積，並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該影響於次年度已不復見。

另一方面，本文以裁決性應計數衡量企業之盈餘管理程度，測試疫情期間企業盈餘管理程度之變化。實證模型結果顯示，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在疫情爆發後疫情初期 2019 年及疫情後期 2020 年度的財務報表，裁決性應計數顯著較 2018 年為高，而未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2019 年及 2020 年度並無顯著較 2018 年高的裁決性應計數。代表相對於未設立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 2019 年與 2020 年財務報表之盈餘管理程度顯著高於 2018 年，此部分之結果說明了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其營運複雜度與資訊不對稱程度較高（陳俞如、金成隆與謝存瑞，2009；Hu, Yang, and Giacomino, 2010），而疫情造成跨境查核困難更給予企業從事盈餘管理的機會，此現象值得主管機關與會計師界關注。

本文另針對在年報查核期間會計師事務所無確診員工之查核工作進行額外分析，並聚焦於 2018 年與 2021 年年報查核工作之差異。實證結果支持未有員工確診的事務所，其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短於 2018 年，但有員工確診的事務所在 2021 年年報之查核期間並未顯著較 2018 年短，而裁決性應計數的分析則發現未有員工確診的事務所，其 2021 年年報之裁決性應計數與 2018 年無顯著差異，但有員工確診的事務所，其 2021 年年報之裁決性應計數顯著較 2018 年低。代表員工確診導致同所查核人員被匡列之事件，對於查核期間長短產生影響，但並未對於受查客戶之盈餘管理程度有顯著負面影響。

本文之學術貢獻及實務意涵如下。首先就學術面來看，本文針對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響的三個財務報告年度（2019 年至 2021 年）以及疫情爆發前之期間（2018 年）進行分析，探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對於受查客戶年報公布之及時性以及盈餘管理程度的影響，有別於過去多數以疫情為探討主題的文獻僅檢視疫情前後應變數的差異（Ali, Amin, Mostafa, and Mohamed, 2022; Hegazy, El-Haddad, and Kamareldawla, 2022; Kend and Nguyen, 2022; Liu and Sun, 2022; Mehnaz, Rahman, and Kabir, 2022），本文特別著重檢視疫情後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隨著疫情進展的逐年變化，故將探討的影響期間拉長，觀察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是否隨疫情發展而有所變動，相較於過去文獻應更能看出疫情影響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的全貌。此外，查核期間可視為審計工作的投入面，而盈餘管理程度則視為審計工作的產出面，故本文的實證結果應能發現疫情對審計品質影響的間接證據。

就實務意涵而言，研究結果發現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確實隨疫情發展而有所變動，除了增進我國政府與實務界對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響審計工作的瞭解外，也隱含了主管機關可隨疫情進展適時調整管制方式以維護監督效果之實務意義。其次，本文分別檢視有無海外子公司企業於疫情期間的查核期間與盈餘管理程度，實證結果發現設有海外子公司企業於疫情初期之查核期間顯著較疫情前長，且盈餘管理程度顯著較疫情前高，代表可能因為部分查核程序受到疫情影響無法執行或需採用替代查核程序，而影響企業查核期間與盈餘管理程度，查核期間的延長將使財務報告及時性降低，而盈餘管理程度提高將使盈餘品質降低，主管機關與會計師應注意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財務報告及時性降低及盈餘管理程度提高之現象並給予不同監督方式。舉例而言，在 2019 年年報申報時，主管機關可以提高企業被實質審閱的比例，降低企業從事盈餘管理的動機，以維持企業財報資訊品質。並且前述監管制度，可能優先適用於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儘管新冠疫情在 2022 年底開始已經逐漸受到控制⁶，但未來台灣若再次面臨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戰，主管機關也可以視企業受到的影響程度不同，調整監管程度。最後，隨著疫情發展、查核期間逐漸縮短與盈餘管理程度逐漸降低的實證結果，顯示了會計師事務所已經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審計準則制訂單位及主管機關應對此有所認知，將遠距查核相關規範加入經常性查核程序，鼓勵查核人員因時制宜、併用傳統實地查核與遠距查核方法，追求更有效的蒐集查核證據，進而改善查核工作效率。

本文之架構安排如後：第貳部分為文獻回顧與假說推論；第參部分為研究方法，說明本文資料來源與實證模型；第肆部份呈現實證結果；最後為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⁶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 2022 年底起逐漸放寬口罩禁令。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6HM1B14lmBfMTwKhc8h6mw?typeid=9>

貳、文獻回顧與假說建立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後，陸續有文章討論新冠肺炎疫情對於會計審計工作的影響，但早期多數為質性的討論 (Appelbaum, Budnik, and Vasarhelyi, 2020; Albitar, Gerged, Kikhia, and Hussainey, 2021; Hay, Shires, and Van Dyk, 2021; Bauer, Humphreys, and Trotman, 2022; Sharma, Sharma, Joshi, and Sharma, 2022)，疫情晚期才逐漸有實證的分析發表於學術期刊⁷(Ali et al., 2022; Hategan, Pitorac, and Crucean, 2022; Hegazy et al., 2022; Kend and Nguyen, 2022; Liu and Sun, 2022; Mehnaz et al., 2022)。就查核程序而言，Appelbaum et al. (2020)認為疫情前審計工作對於「存在」與「發生」等查核目標，即便在科技協助下，仍仰賴現場詢問、實體觀察與文件檢視驗證等需要查核人員在現場執行的查核程序。作者提出在疫情下可能的替代查核程序，以觀察存貨盤點為例，可以請客戶員工以手持攝影機方式讓查核人員可以觀察存貨的盤點。又以文件檢視為例，可以將文件數位化，或以電子認證方式為之。「詢問」為查核人員常使用之查核程序，查核人員可透過溝通的過程，觀察對方的肢體語言進行判斷，疫情下或許可以用視訊會議方式取得實體見面溝通。他們認為，審計人員可透過數位科技克服無法實體查核的困難，但是否能熟練運用數位科技技術在審計工作上，還有待經驗的累積。Albitar et al. (2021)認為事務所可能大量採用證實分析性程序 (substantive analytical procedure) 來克服無法實體查核的困難⁸。他們也對於若事務所大量採用分析性程序取代其他查核程序，可能對審計品質帶來負面影響的憂心。同時，他們也認

⁷ 討論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相關文獻除了本節所提及者外，尚包括疫情對審計意見及公費與會計師揭露關鍵查核事項影響之研究。在審計意見及公費部分，Albitar et al. (2021)認為疫情對企業帶來經營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查核風險，從而影響會計師出具之審計意見，亦可能使公費上升，但另一方面，客戶營運不佳，可能要求會計師降低審計公費。Hay et al. (2021)彙整新冠肺炎疫情對於紐西蘭審計市場改革的可能影響。他們觀察到一家紐西蘭上市公司因為邊境管制緣故無法進行期末存貨盤點，因此會計師出具保留審計意見，另有一些企業取得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此外，在他們的文章中引用了 Audit Analytics 資料庫的報導，包含歐洲與美國企業，取得非無保留意見的企業家數增加，許多企業查核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採用延後公布財報 (late filings) 的公司增加 (<https://blog.auditanalytics.com/covid-19-impacts-on-european-audit-opinions/>, <https://blog.auditanalytics.com/impacts-of-covid-19-on-late-filings/>)。在會計師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影響面，Hategan et al. (2022)以 2019 年至 2020 年歐洲股市為樣本進行分析，討論疫情期間影響會計師揭露關鍵查核事項之因素。實證結果顯示，事務所規模、繼續經營疑慮與關鍵查核事項揭露之個數有顯著正相關，會計師輪調、審計公費與關鍵查核事項揭露個數則無明顯關聯。Hegazy et al. (2022)以問卷調查方式取得疫情期間關鍵查核事項之報導資訊，發現查核人員在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下僅會增加特定關鍵查核事項之揭露。Kend and Nguyen (2022)以澳洲企業於疫情前後發布的查核報告為樣本，採用潛在語意分析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分析關鍵查核事項的選擇與針對關鍵查核事項的查核程序之描述，結果發現平均而言會計師在疫情後減少了關鍵查核事項的揭露，但他們對於其所關注的關鍵查核事項採取了較多的查核程序。Mehnaz et al. (2022)以澳洲的不動產公司為樣本，發現公允價值之補充揭露資訊量與審計公費間存在負向關聯，但此關聯性並未因 2020 年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而增強。作者同時發現公允價值調整數的價值攸關性於疫情期間會因公允價值之補充揭露資訊而提升。

⁸ Albitar et al. (2021)指出證實分析性程序係針對會計項目的未預期波動或因舞弊而導致重大誤述風險之發生原因的一種診斷方法。查核人員可藉由執行證實分析性程序對企業財務狀況有全面性的了解，並減少執行成本較高的細項測試。證實分析性程序之執行成本低，然而不同會計人員對透過分析性程序所得到對會計項目餘額波動的可能解釋並非總是存有一致性，而未能有效率地達到其於查核程序中的證實功能。

為在疫情下，若事務所暫停員工訓練，或因業務緊縮而進行裁員與降薪，可能影響事務所之人力資本。Sharma et al. (2022)以印度會計師為訪問對象，彙整會計師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所為之行動。他們發現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會計師事務所以科技方式完成審計工作，事務所認為未來將普遍併用遠程與實體方式完成審計工作。Bauer et al. (2022)分析疫情對審計團隊決策的影響，指出疫情期間傳統的面對面互動方式已被虛擬團隊取代，作者預期此種替代方式將持續維持於後疫情時代。作者亦分析疫情對於工作底稿複核、舞弊偵測、客戶關係維護等議題之影響。

Appelbaum et al. (2020)認為疫情衝擊整體經濟而對查核風險的評估（包括對客戶營運計劃、融資方式、流動性及財務業務狀況的評估）產生重大影響，會計師在評估受查客戶之公允價值評價、繼續經營與期後事項時，應考量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而須更加謹慎。Albitar et al. (2021)採用桌面研究方法（desk study method）⁹進一步指出，疫情使企業經營風險提升以及企業繼續經營疑慮加深，迫使查核人員採用更多的查核程序。而各國提倡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與居家辦公，使會計師查核更為不易，查核人員的工時與投入因而增加。Hegazy et al. (2022)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探究疫情對查核工作的影響，認為疫情造成查核人員行動受限，與管理階層等企業內部人面對面溝通的困難度增加。此外，蒐集查核證據過程及客戶經營中斷的不確定性亦上升，加上重覆的封城使查核人員在執行查核程序與蒐集適切的查核證據時面臨困難。因此，查核人員需要執行額外查核工作以因應疫情爆發之影響。Kend and Nguyen (2022)以澳洲企業於疫情前後發布的查核報告為樣本，採用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分析關鍵查核事項的選擇與針對關鍵查核事項的查核程序之描述，認為疫情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常規的查核程序變得複雜及耗時。

臺灣的疫情在2020年初爆發，首當其衝的就是當時進行之2019年年報查核，事務所須立即面對查核溝通與人力調度問題，並加以調整因應。為因應疫情，臺灣地區的會計師事務所調整其查核方式，紛紛導入遠距查帳（工商時報，2020a；余至浩，2020），以視訊、文件掃描或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取代親赴其他地區執行查帳工作，例如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所在2020年3月初首先全面導入遠距工作系統（工商時報，2020b）。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也在2020年起推廣數位辦公室，以提升溝通效率、加強資料品質及強化流程軌跡（資誠會計師事務所，2020）。林嬋娟與郭頌君（2020）對台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探討其發展與應用查核分析（即數位轉型）的現況，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查核人員間之資訊能力存在顯著落差，相關訓練成效亦難立即見效，然應用新工具或方法將改變習以為常的作業模式，查核人員往往未能迅速接受改變。此結果也說明了在疫情期間，查核人員必須投入更多心力去學習及適應利用遠距方式進行查核工作。

⁹ 桌面研究方法著重於取得並分析現成資料，是研究起始階段的低成本且有效率的研究方法。資料可以來自企業內部或來自外部（如網路資料、政府的公開資訊或蒐集自顧客之資料）（Management Study Guide, 2012; Khombe, 2014）。

會計師在查核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與努力，在多數國家並未公開揭露，因此審計文獻僅能使用查核期間長短作為會計師查核過程投入的代理變數，會計師對於風險較高的財務報表，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進行查核，導致財務報告公布的時間將向後推延，因此查核期間常被用來衡量審計效率與努力程度(Mitra, Song, and Yang, 2015; Sharma, Tanyi, and Litt, 2017)。本文推論，在疫情初期由於因應客戶審計風險之提升及查核方式的改變及調整，查核人員增加之工時或努力(effort)將反映在查核報告簽發時程的向後推延，提出 H1a 如下：

H1a：企業財務報告查核期間在疫情爆發初期(2019年)顯著較疫情爆發前長。

台灣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審計準則委員會主任委員徐永堅認為疫情的不確定性可能新增企業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查核人員為因應此等風險，可能須調整整體查核策略，增加或調整查核程序(黃曉雯，2020)。如前所述，疫情期間企業的經營風險大幅提升，而為了因應疫情邊境管制與封城對於查核人員執行查核程序與收集查核證據的影響(例如：實體檢視資產、檢查文書證據、收取函證回函等查核證據取得)，會計師事務所各自發展出不同的遠距查核系統。然而即使是對舊客戶進行查核，異於以往的查核風險與查核方式，使查核人員必須重新累積其查核經驗，例如須考量疫情發展而對會計估計重新予以檢視及評估(Levy, 2020)。過去文獻指出，查核人員經驗之累積能協助其判斷查核風險並蒐集適切的證據，進而縮短查核期間(Knechel and Payne, 2001; Dao and Pham, 2014)。就實務層次而言，事務所的遠距查核資訊系統建構隨疫情期間拉長亦逐漸完善，例如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表示，自2021年5月起就實施居家和遠距辦公(中時新聞網，2022)，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2021年的新聞稿也指出，該事務所啟動分流辦公，提供「在家工作說明書」(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21)。由前述報導可知，會計師事務所在2020年查核2019年財務報表之查核過程受到衝擊後，已經制訂相關遠距辦公之準則，並有妥善的因應方式。因此本文推論，隨著疫情期間拉長，查核人員因應疫情的查核風險及查核方式，逐漸累積新的查核經驗，事務所的遠距查核配套措施亦逐漸完備，相較於疫情初期2019年企業財務報告查核期間，疫情後期2020年與2021年企業財務報告查核期間應逐漸縮短，本文假說 H1b 如下：

H1b：企業財務報告查核期間在疫情爆發後期(2020年及2021年)，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縮短。

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75號提到複雜性是企業固有風險因子之一，複雜的組織架構使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的可能性增加。企業之營運複雜度為會計師判斷客戶經營風險與審計風險之重要考量(Simunic, 1980; Bowrin and King, 2010)，進而影響查核流程之設計與工作時程的投入。企業之營運範圍若包含海外子公司，則其組織架構與營運方式較為複雜(陳俞如等人，2009; Hu et al., 2010)，會計師須至主要海外

子公司所在地進行內部控制之瞭解與測試、實體檢視資產之存在與否與檢視相關文書證據等事宜。過去文獻顯示在控制子公司個數下，海外子公司個數與審計公費亦存在顯著正相關 (Bliss, 2011; Xu, Carson, Fargher, and Jiang, 2013; Stewart, Kent, and Routledge, 2016)，而審計公費往往反映受查客戶之風險 (Hay, Knechel, and Wong, 2006; Hay, 2013)，由此可見海外子公司為會計師審計過程中之重要風險來源。同時，Lai (2019)的實證結果顯示，海外子公司對於查核期間長度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因為疫情而發生的封城封廠、邊境管制等規定，使親至海外子公司進行查核受到限制，為取得足夠且適切的查核證據，查核人員可能需改變查核方法及使用替代查核程序 (Accountancy Europe, 2020)。查核受限大幅度改變會計師對於客戶海外子公司之盤查事項，同時會計師與海外子公司會計師人員需重新進行替代程序之安排與討論，海外子公司查核更顯困難。因此本文進一步推論 H1a 之情形於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較為明顯。相對地，臺灣本土在 2020 年初出現第一例確診者後，直至 2021 年 5 月中才提升疫情警戒到第二級¹⁰，雖然一週後隨即提升警戒到第三級¹¹，但同年 7 月 27 日即調整降回二級警戒¹²，並在同年 10 月初初步放寬室外戴口罩規定¹³，10 月中調整集會活動人數上限規範¹⁴，11 月中開始進一步放寬室內待口罩之規定¹⁵。截至 2022 年中，臺灣地區仍維持為二級警戒¹⁶。亦即疫情爆發後各年度的年報查核期間，皆屬臺灣疫情控制較佳的期間，因此本文推論疫情下查核方式變動對查核期間的影響，就臺灣本土企業而言應較不明顯。假說 H1c 推論如下：

H1c：疫情爆發後財務報告查核期間較長之現象，在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更為明顯。

根據審計準則公報第 74 號「查核財務報表對舞弊之責任」，管理當局無法達成財務目標所形成的壓力為影響舞弊的三大因素之一，而管理當局相信能逾越控制的機會則是影響舞弊的三大因素之二。在疫情期間，許多企業之經營績效受到政府的防疫限制而產生負面影響 (Kend and Nguyen, 2022)，可能導致管理當局從事盈餘管理的動機上升。Liu and Sun (2022)以美國 2019 年及 2020 年非金融業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企業盈餘對股價的解釋力顯著降低。Taylor, Awuye, and Cudjoe (2023)以歐洲上市銀行為樣本，發現銀行的盈餘管理幅度於疫情後 (2020 年)顯著上升。在此同時，當會計師無法進行實體查核而需採用替代查核程序或遠距查核時，蒐集查核證據過程的不確定性亦上升 (Hegazy et al., 2022)，於是給予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機會。Levy (2020)亦認為圍於疫情而採遠距工作方式及工作時程

¹⁰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PHRzem5q4pU7_vHvVdCmRw?typeid=9。

¹¹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abDtRS-xzxtQeAchjX9fqw?typeid=9>。

¹²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e0v8zImE3rGJ0072A86NHA?typeid=9>。

¹³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V-VIRjhXDQ5ZTI-ScMTxDA?typeid=9>。

¹⁴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Da_0VerVFpTxVKUGXpm3jA?typeid=9。

¹⁵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t1ZkwD4IHXGCj3ffMCK4ng?typeid=9>。

¹⁶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FNjpfKjhjxvQ-imhFpOjeA?typeid=9>。

的變動可能限制了查核人員蒐集直接證據的能力，故採用了可信程度較低的間接證據。Sharma et al. (2022)的研究指出，受訪會計師認為難以確認遠距取得資料之誠信度，進而影響查核報告的可靠性。綜合前述，本文提出假說 H2a：

H2a：企業之盈餘管理程度在疫情爆發初期（2019 年）顯著較疫情爆發前高。

然而，事務所的遠距查核能力隨著疫情發展逐漸提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2021；中時新聞網, 2022)，愈能取得可靠的查核證據。而隨著查核經驗的累積，查核人員愈能分辨資訊的攸關程度，也愈不會受到管理階層的影響，因此企業得以從事盈餘管理的空間將逐漸受限 (Chi, Myers, Omer, and Xie, 2017)。據此，本文推論 H2b：

H2b：企業之盈餘管理程度在疫情爆發後期（2020 年及 2021 年），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降低。

Ali et al. (2022)以 2015 年至 2020 年間，位於 G12 國家的 5,519 筆公司-年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在疫情期間，相對於位於對投資人保護較差的國家之企業，位於對投資人保護較佳國家之企業裁決性應計數明顯較低。換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下，並非所有企業盈餘管理程度受到的影響都相同。過去研究顯示，企業的組織架構或營運複雜度會影響盈餘品質與審計品質，Bushman, Chen, Engel, and Smith (2004)指出組織複雜度會影響企業的透明度，Lee, Lev, and Yeo (2007)認為複雜的組織結構下容易產生企業內部勾結而提高盈餘管理的可能性。Demirkan, Radhakrishnan, and Urcan (2012)發現多部門之企業較單一部門之企業有較差的裁決性應計數品質。Simunic (1980)指出受查客戶的營運複雜度將使會計師於委任中承擔較高的損失暴露。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75 號也提到複雜性是企業固有風險因子之一，複雜的組織架構使發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的可能性增加。而陳俞如等人 (2009)認為海外投資導致企業的財務報表複雜化，加重經理人與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使經理人較有機會採取投機性的盈餘管理。Hu et al. (2010)指出海外營運帶給企業較多的自由現金流量，而使對現金流量具裁量權的經理人有誘因在報導盈餘時帶有偏差與雜訊 (bias and noise)，此外，跨國企業的營運複雜度也使主管機關或會計師事務所對經理人的監督較困難。Bedard, Hoitash, Hoitash, and Westermann (2012)以 2004 年至 2006 年的美國企業為樣本，發現企業複雜度 (包括是否具有海外營運) 對重大缺失改善有負向影響，而特定重大缺失的改善與裁決性應計數的變動數呈負向關聯。另一方面，我國審計準則公報第 75 號「辨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中也提到，擴展國外營運可能是查核人員需要重視的風險。

綜上所述，企業組織架構與營運複雜度對於盈餘管理與審計風險有顯著影響 (Simunic, 1980; Lee et al., 2007; Demirkan et al., 2012)，然相較無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設有海外子公司企業的組織架構與營運方式是較複雜 (陳俞如等人, 2009; Hu et al., 2010)，故這類企業的盈餘管理的空間較大，加上疫情影響其營運績效期間，

管理當局承受的財務目標達成壓力，使得他們尋找更多的機會去進行盈餘管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疫情下會計師對跨國企業執行審計工作受到的防疫限制遠高於非跨國企業，更提升設有海外子公司企業管理當局盈餘管理之機會。因此本文推論，受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企業之盈餘管理程度在疫情期間相對較高，且此現象在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更為明顯。本文假說 H2c 如下：

H2c：疫情爆發後盈餘管理程度較高之現象，在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更為明顯。

參、研究方法

(一)實證模型

本文參考過去文獻 (Tanyi, Raghunandan, and Barua, 2010; Knechel and Sharma, 2012; Sharma et al., 2017)，以查核報告日與資產負債表日間之天數取自然對數衡量查核期間，並設立 *YEAR19*、*YEAR20* 與 *YEAR21* 等三個年度別虛擬變數，檢測臺灣上市櫃公司之年報查核期間是否在受疫情影響期間顯著較 2018 年未受疫情影響期間為長¹⁷。實證模型亦控制受查客戶財務狀況與特徵，及會計師事務所特性對於查核期間之影響。實證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TIMELAG_{it} = & \alpha_0 + \alpha_1 YEAR19_{it} + \alpha_2 YEAR20_{it} + \alpha_3 YEAR21_{it} + \alpha_4 LNNTA_{it} + \alpha_5 LEV_{it} \\ & + \alpha_6 ARINV_{it} + \alpha_7 LOSS_{it} + \alpha_8 CFOTA_{it} + \alpha_9 ROA_{it} + \alpha_{10} MB_{it} + \alpha_{11} LNAGE_{it} \\ & + \alpha_{12} ISSUE_{it} + \alpha_{13} BIG4_{it} + \alpha_{14} GC_{it} + \alpha_{15} TENURE_{it} + \alpha_{16} FSUB_{it} + \alpha_{17} LIQ_{it} \\ & + \alpha_{18} \Delta EPS_{it} + \alpha_{19} ZSCORE_{it} + \sum \alpha_i Industry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上式中，依變數查核期間定義為資產負債表日到查核報告日的天數（查核天數 *TIME*）取自然對數之值，以 *TIMELAG* 表示。本文關注之自變數 *YEAR19* (*YEAR20*/*YEAR21*) 係虛擬變數，觀察值之年報所屬期間為 2019 (2020/2021) 年為 1，其餘設為 0。式中的控制變數係參考過去文獻，以下將依序說明。就受查客戶財務狀況而言，負債比例較高的公司，風險較高，查核人員可能擴大查核範圍以減低風險，本文以期末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衡量受查客戶之負債比率 (*LEV*) (廖秀梅與廖益興，2002；Lai, 2019)，並預期其係數為正。經營表現較差的公司，營運風險較高，查核人員可能設定較大的查核範圍，本文以當期稅前淨利是否為負 (*LOSS*) (林有志、黃劭彥、辛宥呈與施志成，2007；Lai, 2019) 之虛擬變數與當期來自營運活動現金流量除以期末總資產 (*CFOTA*) (Knechel, Sharma, and Sharma, 2012) 及當期稅前淨利除以總資產 (*ROA*) (廖秀梅與廖益興，2002；Lai, 2019) 等兩比率衡量企業經營狀況，並預期當期稅前淨利是否為負 (*LOSS*) 之係數為正，當期來自營運活動現金流量除以

¹⁷ 過去文獻分別就投入面及產出面衡量審計品質 (如 Rajgopal, Srinivasan, and Zheng, 2021)，且衡量指標眾多。本篇對投入面僅就查核期間進行探討，係因查核期間反映的是會計師於審計工作的投入，且係法令所規範，實務意義重大，本文聚焦於此變數應具有衡量審計品質投入面的相當代表性。

期末總資產 (*CFOTA*) 及當期稅前淨利除以總資產 (*ROA*) 之係數為負。財務狀況較差的公司，查核人員可能增加投入以降低查核風險，本文分別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LIQ*) 及破產風險 (*ZSCORE*) 衡量企業財務狀況 (Lai, 2019; Bryan and Mason, 2020)¹⁸，並預期其係數為負。企業傾向於提早宣告盈餘增加的好消息，因此可能縮短查核期間，本文以當期每股盈餘減前期每股盈餘再除以前期每股盈餘之絕對值 (ΔEPS) 衡量公司的好消息 (Lai, 2019)，並預期係數為負。

而就受查客戶業務特徵來看，客戶規模較大可能需要較長的查核期間，本文以取對數後的企業期末總資產 (千元) 衡量受查客戶資產規模 (*LNTA*)，並預期其係數為正 (林有志等人, 2007; 范宏書、林彥廷與陳慶隆, 2013; Lai, 2019)。應收帳款常使用函證程序，所花費的時間較長，存貨若分散各地倉儲且無法實體觀察盤點，查核人員需要比對交易單據與送貨憑證等，亦可能花費較長的時間，本文以期末應收帳款加上存貨再除以總資產的比率衡量應收帳款與存貨佔總資產的比率 (*ARINV*) (Durand, 2019; Habib, Bhuiyan, Huang, and Miah, 2019)，並預期其係數為正。成長性高的企業可能採取較投機性的管理方式，因此需要投入較多時間於查核其財報，本文以受查客戶之市價淨值比 (*MB*) 衡量成長性 (Sultana, Singh, and Van der Zahn, 2015)，並預期其係數為正。成立年數較短的公司比成立較久的公司有較高的財報舞弊傾向，因此較可能有較長的查核期間，故本文控制成立年數取自然對數 (*LNAGE*) (Blankley, Hurtt, and MacGregor, 2014; Durand, 2019)，並預期其係數為負。公司發行新股與發行公司債時需要實地審查 (due diligence)，因此需要較長的查核期間，因此本文控制公司當期發行新股與發行公司債時，虛擬變數 (*ISSUE*) 之值設為 1 (Knechel and Sharma, 2012; Knechel et al., 2012)，並預期其係數為正。

除了控制受查客戶財務與業務特徵外，亦控制事務所特徵。規模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較充裕的人力及經驗，對查核工作有較佳的安排，因此能縮短查核期間，本文以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 (*BIG4*) 之虛擬變數衡量事務所規模 (林有志等人, 2007; 范宏書等人, 2013)，並預期其係數為負。會計師出具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時，公司通常會與會計師再協商，因此使查核期間拉長，本文控制會計師是否出具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 (*GC*) 之虛擬變數¹⁹ (林有志等人, 2007; 范宏書等人, 2013; Dao and Pham, 2014)，並預期其係數為正。會計師事務所任期愈長，對客戶的財務狀況愈了解，愈能有效率地完成查核工作而縮短查核期間，因此本文控制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 (Dao and Pham, 2014; Durand, 2019)，並預期其係數為負。最後，設立產業別之虛擬變數，控制不同產業對查核期間的影響。本文預期事務所於查核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在疫情期間有較大挑戰，因此將是否設有海外子公司 (*FSUB*) 加入控制變數，後續將針對企業有與無設立海外子公司兩組子樣本進行額外分析。

¹⁸ Altman (1968) $Z\text{-score} = 1.2 \times (\text{營運資金}/\text{總資產}) + 1.4 \times (\text{保留盈餘}/\text{總資產}) + 3.3 \times (\text{稅前息前淨利}/\text{總資產}) + 0.6 \times (\text{總市值}/\text{總負債}) + 1.0 \times (\text{營業收入}/\text{總資產})$

¹⁹ 樣本中並未有公司取得修正式意見。

本文研究假說 H2a、H2b 及 H2c 在討論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企業盈餘管理程度之影響。財務報表係以應計基礎編製，會計準則允許管理當局對應計項目擁有自由裁量彈性，使管理當局存在操弄盈餘的機會。過去許多文獻以裁決性應計數作為衡量管理當局盈餘管理程度之指標²⁰，當企業向上（下）盈餘管理程度越高時，裁決性應計數將越大（小）（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5; Kothari, Leone, and Wasley, 2005）。本文參考過去文獻，以裁決性應計數捕捉盈餘管理程度。

在衡量裁決性應計數的模型中，本文採用加入前期資產報酬率下，產業別橫斷面之 Modified Jones Model 估計非裁決性應計數（Kothari et al., 2005），估計模型如下：

$$TAC_{it} / TA_{it-1} = \alpha + \beta_1(1 / TA_{it-1}) + \beta_2[(\Delta REV_{it} - \Delta ARE_{it}) / TA_{it-1}] + \beta_3(PPE_{it} / TA_{it-1}) + \beta_4 ROA_{it-1} + \varepsilon_{jt} \quad (2)$$

上式中，依變數總應計數定義為繼續營業部分稅前淨利減去來自營業之現金流量之值，以 TAC 表示。自變數 TA 為期末總資產； ΔREV 為淨營業收入變動數，以當期淨營業收入減前期淨營業收入， ΔARE 為應收帳款淨額變動數，以當期期末應收帳款淨額減前期期末應收帳款淨額； PPE 為期末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 ROA 為前期資產報酬率，以前期稅前淨利除以前期期末總資產。

本文以分產業分年度方式²¹，先估計式(2)中之係數，再將所估計得出的係數值代入式(2)中計算求出各公司各年度之非裁決性應計數，最後再將各公司各年之總應計數減除非裁決性應計數，即可得出企業各年度之裁決性應計數（ DA ），此即為本文盈餘管理程度之衡量變數值。

本文預期相對於在本土經營的企業，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由於營運複雜度較高因使管理當局有較多的機會進行盈餘管理，同時疫情下會計師對跨國企業審計受到的侷限遠高於非跨國企業。因此除年度別虛擬變數（ $YEAR19$ 、 $YEAR20$ 、 $YEAR21$ ）外，設立受查客戶是否設有海外子公司（ $FSUB$ ）之虛擬變數，並檢測該變數的係數是否顯著，同時將樣本依是否具有海外子公司分為兩組子樣本，以此瞭解在疫情影響下審計人員查核時面臨的挑戰。實證模型(3)如下：

²⁰ 過去文獻亦有以是否進行門檻之盈餘管理、實質盈餘管理（Roychowdhury, 2006）及分類變動盈餘管理（McVay, 2006）等做為盈餘管理之代理變數。然而，我國分析師對於企業盈餘之預測未如歐美國家成熟，法規也未強制企業發佈盈餘預測，因此較難以用企業是否會針對盈餘預測進行門檻之盈餘管理。其次，Roychowdhury (2006) 提出之實質盈餘管理係以偏離正常經營模式的手段來達到特定盈餘門檻的目的，手段包括提供現金折扣以刺激短期的銷貨收入、減少裁決性的現金支出（如研發費用）或將製造費用分攤至存貨以降低銷貨成本。然而，疫情期間企業的經濟活動受到管制，各行各業均面臨經營困境。為求生存，給予客戶折扣刺激消費或減少非緊急的非必要支出係因應疫情期間的特殊經營環境的適當經營方式，實證上難以區分這些手段是偏離正常經營模式的實質盈餘管理或因應疫情經營困境的正常經營手法。最後，台灣採用 IFRS 後，財務報表已無非常項目，因而無法計算 McVay (2006) 一文中用以衡量盈餘管理的核心盈餘（core earnings）。綜上，本文以裁決性應計數作為審計品質產出面與衡量盈餘管理程度之指標。

²¹ 為了避免觀察值個數過低，本研究刪除同年同產業觀察值個數較少的水泥業、玻璃陶瓷業、造紙業與電子商務業。此外，由於「其他產業」內的公司特徵變異較大，較不適合計算裁決性應計數審計品質（Wu, Huang, Yu, and Wu, 2020），所以在盈餘管理的模型中也排除產業代碼為 99 之企業。

$$\begin{aligned}
DA_{it} = & \alpha_0 + \alpha_1 YEAR19_{it} + \alpha_2 YEAR20_{it} + \alpha_3 YEAR21_{it} + \alpha_4 FSUB_{it} + \alpha_5 LNTA_{it} \\
& + \alpha_6 LEV_{it} + \alpha_7 LOSS_{it} + \alpha_8 CFOTA_{it} + \alpha_9 GROWTH_{it} + \alpha_{10} MB_{it} \\
& + \alpha_{11} BIG4_{it} + \alpha_{12} GC_{it} + \alpha_{13} TENURE_{it} + \sum \alpha_i Industry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3)$$

控制變數部分，Watts and Zimmerman (1978)認為規模較大的公司，較容易引起政府的關注，公司可能基於降低政治成本的動機，進行使盈餘減少的盈餘管理，故控制企業規模 (*LNTA*) 的影響，並預期係數為負。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的研究指出當企業之盈餘呈現虧損時，管理當局愈有可能操弄財報盈餘數字，因此本文設立當期是否虧損之虛擬變數 (*LOSS*)，控制企業經營績效對盈餘管理程度的影響，並預期該變數係數顯著為正。Becker, DeFond, Jiambalvo, and Subramanyam (1998)認為財務槓桿愈高的公司，其裁決性應計項目愈大，管理當局從事盈餘管理的動機較高，因此本文納入公司負債比率 (*LEV*) 為控制變數，並預期係數為正。過去的研究亦發現營業活動現金流量與異常應計項目呈負向關聯 (Becker et al., 1998)，故控制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CFOTA*) 之影響，並預期係數為負。Beaver, Kettler, and Scholes (1970)認為，成長型企業會較有誘因透過操縱應計項目以達平穩化盈餘的目的；Skinner and Sloan (2002)認為，成長型公司報導之未預期盈餘為負時，市場恐會給予嚴厲懲罰，因此成長中公司會較有誘因使用裁決性應計數以達成績效門檻。故控制企業之成長程度 (*GROWTH*、*MB*) 的影響，預期兩變數之係數為正。

過去許多研究發現，簽證會計師特徵可能影響企業盈餘管理行為，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相對於其他會計師事務所，較有能力抑制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 (Becker et al., 1998; Francis, Maydew, and Sparks, 1999)，因此本文設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虛擬變數 (*BIG4*)，控制事務所對盈餘管理之影響，預期*BIG4*係數為負。會計師任期較長之審計品質較佳 (Chen, Lin, and Lin, 2008)，因此本文納入會計師事務所任期 (*TENURE*)。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發現因繼續經營疑慮而被簽發保留意見或修正無保留意見之公司具有較高的裁決性應計數，故本文亦納入會計師是否簽發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虛擬變數 (*GC*)。最後，納入產業別之虛擬變數，控制不同產業盈餘管理行為的差異。

(二)樣本篩選經過

本文所有研究變數資料取自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以下簡稱 TEJ)，並自 IFRS Finance 模組之會計師報告中，取得上市櫃公司財報公布日期，樣本期間為 2018 年到 2021 年，原始樣本共 6,955 筆觀察值。部分公司並未在證交法規範時間內揭露財報，為避免這些企業查核期間較長影響實證結果，因此排除這些公布日期異常者共 18 筆²²。此外，金融業產業特性與其他行業不同，因此排除金融業之觀察值共 172 筆。最後，刪除資料缺漏不全之觀察值者計 225 筆，模型

²² 公開資訊觀測站上顯示因疫情申請延期公告財務報表的公司僅 6 家，唯企業可能因其他原因無法於法定限制期間前公布財報，本文刪除 TEJ 資料庫中顯示，上市櫃公司財報公布日於 3 月 31 日之後的樣本觀察值。

(1)之最終樣本計 6,540 筆觀察值。由於模型(1)與模型(3)之控制變數不完全相同，因此模型(3)樣本刪除資料缺漏不全之觀察值者計 196 筆，再扣除因計算裁決性應計數所需樣本數不足之各年度產業樣本 101 筆及公司特徵變異較大、不適合計算裁決性應計數之其他產業樣本 525 筆 (Wu, Huang, Yu, and Wu, 2020)，最終得出之模型(3)樣本計 5,943 筆觀察值。樣本篩選經過詳見表 1 之 Panel A 及 Panel B。表 1 之 Panel C 呈現模型(1)樣本之產業分布，以電子業為最多，占樣本之 49.79%。

表 1 樣本篩選過程與產業分布

Panel A：模型 1 樣本篩選經過 (N=6,540)					
	2018	2019	2020	2021	total
原始樣本	1,722	1,731	1,744	1,758	6,955
延遲公布者	(7)	(7)	(1)	(3)	(18)
金融業	(43)	(43)	(43)	(43)	(172)
資料缺漏不全	(88)	(61)	(47)	(29)	(225)
合計	1,584	1,620	1,653	1,683	6,540
Panel B：模型 2 樣本篩選經過 (N=5,943)					
	2018	2019	2020	2021	total
原始樣本	1,722	1,731	1,744	1,758	6,955
延遲公布者	(7)	(7)	(1)	(3)	(18)
金融業	(43)	(43)	(43)	(43)	(172)
資料缺漏不全	(79)	(54)	(41)	(22)	(196)
計算裁決性應計數樣本數不足者	(25)	(25)	(25)	(26)	(101)
產業性質特殊	(128)	(130)	(133)	(134)	(525)
合計	1,440	1,472	1,501	1,530	5,943
Panel C：樣本產業分布 (N=6,540)					
產業代碼與名稱	觀察值數與比率				
11 水泥	28 0.43%				
12 食品	110 1.68%				
13 塑膠	98 1.50%				
14 紡織	208 3.18%				
15 電機機械	353 5.40%				
16 電器電纜	66 1.01%				
17 化學生技醫療	623 9.53%				
18 玻璃陶瓷	19 0.29%				
19 造紙	24 0.37%				
20 鋼鐵	181 2.77%				
21 橡膠	48 0.73%				
22 汽車	125 1.91%				
23 電子	3,256 49.79%				

表 1 樣本篩選過程與產業分布 (續)

產業代碼與名稱		觀察值數與比率	
25	建材營造	302	4.62%
26	航運	112	1.71%
27	觀光	161	2.46%
29	貿易百貨	138	2.11%
32	文化創意	96	1.47%
34	電子商務	28	0.43%
97	油電燃氣	48	0.73%
99	其他	516	7.89%

肆、實證結果

(一) 主要實證結果

為避免極端值影響實證結果，本文將所有連續性變數值大於第 99 百分位值與小於第 1 百分位值之資料，分別以第 99 百分位值或第 1 百分位值取代之。表 2 為樣本敘述性統計，由表 2 中數據可知，查核天數 (*TIME*) 平均數為 75.3 天，最小值為 12 天，最大值為 91 天。由 Panel A 可知，裁決性應計數 (*DA*) 之平均值為 0.002，最大與最小值分別為 1.942 與 -1.929，顯示樣本中同時存有操弄盈餘增加及操弄盈餘減少的公司，且操弄幅度相當大。約有 83.0% 的樣本有設立海外子公司 (*FSUB*)。負債比率 (*LEV*) 平均值為 42.6%，應收帳款與存貨佔總資產的比率 (*ARINV*) 平均值為 29.8%，約有 19.6% 的觀察值當期虧損 (*LOSS*)，資產報酬率 (*ROA*) 平均為 4.2%，市價淨值比 (*MB*) 平均值為 2.070，最大值為 12.39，但最小值為 0.47，顯示有部分公司淨值較市價為低。平均銷貨收入成長率 (*GROWTH*) 為 10.9%，有 88.7% 的觀察值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BIG4*)，樣本中僅有 0.7% (46 筆) 觀察值取得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之審計意見 (*GC*)，平均事務所任期 (*TENURE*) 為 16.82 年。平均流動比率 (*LIQ*) 為 2.745，每股盈餘變動率 (ΔEPS) 中位數為 0.093，平均數為 0.500，呈右偏分配，*ZSCORE* 平均數為 4.275。

為了進一步瞭解，不同年度間，設有海外子公司企業與未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查核期間與盈餘管理程度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文於表 2 Panel B 及 Panel C 先依年度將樣本分為 4 組子樣本，再把每個年度的子樣本依有無海外子公司分為 2 個更小的子樣本，並分別針對 12 組子樣本列示本文應變數查核期間 (*TIMELAG*) 及盈餘管理程度 (*DA*) 之平均數敘述性統計。由 Panel B 可見，全部樣本的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年報查核期間為長 (差異=0.019，達 1% 顯著水準)，初步支持假說 H1a。全部樣本的 2020 年年報查核期間較 2018 年年報查核期間為短 (差異=-0.008，達單尾 10% 顯著水準)，全部樣本的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年報查核期間為短 (差異=-0.036，達 1% 顯著水準)，前述統計結果初步支持假說 H1b。此外，僅有海外子公司

樣本的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年報查核期間為長 (差異=0.020, 達 1%顯著水準), 無海外子公司樣本的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與 2018 年年報查核期間無顯著差異 (差異=0.012, 未達顯著水準), 初步支持假說 H1c。至於盈餘管理的分析上, 敘述性統計結果並未顯示存有年度間的顯著差異。

表 2 樣本敘述性統計

Panel A: 全樣本 (N=6,540)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i>TIMELAG</i>	4.308	0.175	2.485	4.357	4.511
<i>DA</i>	0.002	0.107	-1.929	-0.002	1.942
<i>FSUB</i>	0.830	0.376	0.000	1.000	1.000
<i>YEAR19</i>	0.248	0.432	0.000	0.000	1.000
<i>YEAR20</i>	0.253	0.435	0.000	0.000	1.000
<i>YEAR21</i>	0.257	0.437	0.000	0.000	1.000
<i>LNTA</i>	15.415	1.465	12.456	15.247	19.944
<i>LEV</i>	0.426	0.186	0.053	0.429	0.869
<i>ARINV</i>	0.298	0.186	0.002	0.279	0.834
<i>LOSS</i>	0.196	0.397	0.000	0.000	1.000
<i>CFOTA</i>	0.053	0.100	-0.294	0.055	0.319
<i>ROA</i>	0.042	0.084	-0.292	0.043	0.291
<i>MB</i>	2.070	1.741	0.470	1.570	12.390
<i>GROWTH</i>	0.109	0.442	-0.736	0.045	3.082
<i>LNAGE</i>	3.353	0.519	0.693	3.434	4.331
<i>ISSUE</i>	0.198	0.399	0.000	0.000	0.000
<i>BIG4</i>	0.887	0.317	0.000	1.000	1.000
<i>GC</i>	0.007	0.086	0.000	0.000	1.000
<i>TENURE</i>	16.820	9.300	1.000	16.000	39.000
<i>LIQ</i>	2.745	2.670	0.455	1.916	18.413
<i>ΔEPS</i>	0.500	3.561	-13.438	0.093	22.333
<i>ZSCORE</i>	4.275	4.681	-0.640	3.010	32.937

變數定義: *TIMELAG* 係查核期間, 資產負債表日到查核報告日的天數 (查核天數 *TIME*) 取自然對數; *DA* 係裁決性應計數; *YEAR19* (*YEAR20* / *YEAR21*) 係虛擬變數, 觀察值之年報所屬期間為 2019 (2020 / 2021) 年為 1, 其餘設為 0; *FSUB* 係虛擬變數, 觀察值設有海外子公司為 1, 其餘設為 0; *LNTA* 係企業期末資產 (千元) 取自然對數; *LEV* 係負債比率, 為期末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 *ARINV* 係期末應收帳款與存貨佔資產的比率; *LOSS* 係虛擬變數, 當期稅前淨利為負者為 1, 其餘為 0; *CFOTA* 係當期來自營運活動現金流量除以期末總資產; *ROA* 係資產報酬率, 為當期稅前淨利除以總資產; *MB* 係期末市價淨值比; *GROWTH* 係銷貨收入成長率; *LNAGE* 係公司成立年數取自然對數; *ISSUE* 係虛擬變數, 當期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中, 顯示現金增資、發行特別股、發行公司債者為 1, 其餘為 0; *BIG4* 係虛擬變數,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者為 1, 其餘為 0; *GC* 係虛擬變數, 當期會計師簽發繼續經營假設有疑慮審計意見者設為 1, 其餘為 0; *TENURE* 係會計師事務所之任期; *LIQ* 係流動比率, 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ΔEPS* 係每股盈餘變動率; *ZSCORE* 係 Altman (1968) Z-score。

表 2 樣本敘述性統計 (續)

Panel B: 依年度—有無海外子公司區分樣本之查核期間平均數												
年	(1)			(2)			(1)-(2)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2018	4.315	1,584	4.321	1,321	4.285	263	0.036	3.104***				
2019	4.334	1,620	4.341	1,351	4.297	269	0.044	4.105***				
2020	4.307	1,653	4.314	1,379	4.273	274	0.041	3.374***				
2021	4.279	1,683	4.285	1,378	4.251	305	0.034	2.984***				
2018 v.s. 2019	0.019	3.163***	0.020	3.196***	0.012	0.730						
2018 v.s. 2020	-0.008	-1.296 [#]	-0.007	-1.077	-0.012	-0.765						
2018 v.s. 2021	-0.036	-5.924***	-0.036	-5.494***	-0.034	-2.114**						
Panel C: 依年度—有無海外子公司區分樣本之裁決性應計數平均數												
年	(1)			(2)			(1)-(2)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全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無海外子公司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平均數/差異	N/t-value
2018	0.001	1,440	-0.002	1,205	0.015	235	0.017	1.842**				
2019	0.002	1,472	-0.001	1,233	0.013	239	0.013	2.085**				
2020	0.002	1,501	0.001	1,257	0.008	244	0.007	0.970				
2021	0.003	1,530	0.002	1,258	0.008	272	0.007	0.944				
2018 v.s. 2019	0.001	0.167	0.001	0.359	-0.003	-0.161						
2018 v.s. 2020	0.001	0.261	0.003	0.749	-0.008	-0.424						
2018 v.s. 2021	0.002	0.446	0.004	0.903	-0.007	-0.416						

***、**、*表示1%、5%、10%雙尾顯著水準，[#]表示10%單尾顯著水準。

表 3 為查核期間之實證結果²³。由表 3 Panel A 全樣本之實證結果可見，整體樣本顯示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的查核時間顯著較 2018 年長 ($YEAR19=0.023$ ，達 1% 顯著水準)，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的查核期間與 2018 年無顯著差異，而 2021 年年報的查核期間顯著比 2018 年短 ($YEAR21=-0.023$ ，達 1% 顯著水準)。顯示平均而言，會計師事務所在面臨疫情挑戰的第一年確實花費較多時間進行查核，導致查核報告出具期間略晚。但隨著遠距查核經驗的累積，疫情進入第二年時遠距查核已順利步上軌道，相較於 2018 年年報，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查核期間並未顯著延長。2021 年更可能因遠距查核提升整體查核效率，使查核期間相較於非疫情期間顯著縮短。就全體上市櫃公司的樣本來看，在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時期假說 H1a 得到支持，疫情後期 2020 年及 2021 年年報查核時期假說 H1b 得到支持^{24,25}。

進一步將樣本區分為受查客戶擁有海外子公司以及受查客戶並未有海外子公司兩個子樣本估計式(1)。表 3 Panel A 顯示，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與全樣本相似，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時間顯著較 2018 年長 ($YEAR19=0.026$ ，達 1% 顯著水準)，疫情後期 2020 年年報查核期間不顯著異於 2018 年 ($YEAR20=0.002$ ，未達顯著水準)，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短 ($YEAR21=-0.023$ ，達 1% 顯著水準)。而受查客戶無海外子公司的樣本的估計結果發現，2019 與 2020 年年度別虛擬變數皆不顯著 ($YEAR19=0.012$ ， $YEAR20=-0.008$ ，皆未達顯著水準)，但 2021 年年度別虛擬變數顯著為負 ($YEAR21=-0.026$ ，達 1% 顯著水準)。顯示疫情後期 2020 年時，無海外子公司的客戶審計工作並未受到影響，而隨著熟稔各種遠距查核方式，本土企業與具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之查核期間皆縮短。綜上所述，疫情初期的年報查核期間有延長一現象，較顯著存在於有海外子公司之樣本中，假說 H1c 獲得支持。然當疫情持續發展時，無論企業有或無設立海外子公司，皆未發現有類似初期的現象。

進一步針對表 3 Panel A 各類樣本估計結果的各年度別虛擬變數 ($YEAR19$ 、 $YEAR20$ 、 $YEAR21$) 進行同一模式中的係數差異性比較，彙總結果如表 3 Panel B 所示。表中數據顯示不管就全樣本或有海外子公司的樣本，年度別虛擬變數之差異 $YEAR19$ 與 $YEAR20$ 間、 $YEAR20$ 與 $YEAR21$ 間及 $YEAR19$ 與 $YEAR21$ 間均顯著為負 (全樣本 $YEAR20-YEAR19=-0.023$ ， $YEAR21-YEAR20=-0.023$ ， $YEAR21-YEAR19=-0.046$ ，p-value 均小於 0.01；有海外子公司的樣本 $YEAR20-YEAR19=-0.024$ ， $YEAR21-YEAR20=-0.025$ ， $YEAR21-YEAR19=-0.049$ ，p-value 均小於 0.01)，顯示就全樣本或有海外子公司的樣本而言，疫情期間的查核期間逐年顯著縮短。而就無海外子公司的樣本而言， $YEAR19$ 與 $YEAR20$ 間及 $YEAR20$ 與 $YEAR21$ 間並無顯著差異 ($YEAR20-YEAR19=-0.020$ ，

²³ 本文另以海外子公司個數及海外子公司個數取自然對數取代有無海外子公司之虛擬變數作為控制變數，實證結果發現年度別虛擬變數之係數顯著性不受影響。

²⁴ 本文另將裁決性應計數加入模型(1)，重新執行迴歸，實證結果未有重大改變。

²⁵ 本文另將個人層級的會計師特性 (任期、經驗及是否為產業專精會計師) 加入模型(1)，重新執行迴歸，實證結果未有重大改變。

$YEAR21-YEAR20=-0.018$ ， p -value 均大於 0.10)，但 $YEAR19$ 與 $YEAR21$ 間差異顯著為負 ($YEAR21-YEAR19=-0.038$ ， p -value=0.011，達 5%顯著水準)，顯示就整個疫情期間來看，無海外子公司的樣本其查核期間仍有縮短的情形。

表 3 查核期間分析

Panel A：迴歸結果			
	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FSUB=1$)	無海外子公司 ($FSUB=0$)
Intercept	4.550*** (0.000)	4.589*** (0.000)	4.542*** (0.000)
$YEAR19$	0.023*** (0.000)	0.026*** (0.000)	0.012 (0.429)
$YEAR20$	-0.000 (0.949)	0.002 (0.697)	-0.008 (0.618)
$YEAR21$	-0.023*** (0.000)	-0.023*** (0.000)	-0.026* (0.086)
$LNTA$	-0.015*** (0.000)	-0.013*** (0.000)	-0.020*** (0.001)
LEV	0.097*** (0.000)	0.081*** (0.000)	0.177*** (0.000)
$ARINV$	0.021* (0.094)	0.046*** (0.002)	-0.063* (0.057)
$LOSS$	0.018*** (0.009)	0.022*** (0.005)	-0.001 (0.966)
$CFOTA$	-0.095*** (0.001)	-0.134*** (0.000)	-0.007 (0.910)
ROA	-0.094** (0.029)	-0.109** (0.013)	-0.011 (0.908)
MB	-0.017*** (0.000)	-0.015*** (0.000)	-0.026*** (0.000)
$LNAGE$	0.027*** (0.000)	0.025*** (0.000)	0.052*** (0.000)
$ISSUE$	0.007 (0.223)	0.004 (0.444)	0.024* (0.096)
$BIG4$	-0.031*** (0.000)	-0.028*** (0.000)	-0.055*** (0.000)

表 3 查核期間分析 (續)

	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i>FSUB</i> =1)	無海外子公司 (<i>FSUB</i> =0)
<i>GC</i>	0.062*** (0.002)	0.031 (0.283)	0.096* (0.073)
<i>TENURE</i>	-0.000 (0.133)	-0.000 (0.112)	0.000 (0.847)
<i>FSUB</i>	0.065*** (0.000)		
<i>LIQ</i>	0.000 (0.839)	0.000 (0.256)	-0.000 (0.757)
Δ <i>EPS</i>	0.000* (0.075)	0.000 (0.101)	0.001 (0.221)
<i>ZSCORE</i>	-0.000 (0.765)	-0.001*** (0.008)	0.002** (0.017)
<i>IND</i>	Included	Included	Included
Observations	6,540	5,429	1,111
Adj R-squared	14.0%	13.9%	15.6%

Panel B：年度虛擬變數差異檢定結果

	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i>FSUB</i> =1)	無海外子公司 (<i>FSUB</i> =0)
<i>YEAR19=YEAR20</i>	-0.023*** (0.000)	-0.024*** (0.000)	-0.020 (0.188)
<i>YEAR20=YEAR21</i>	-0.023*** (0.000)	-0.025*** (0.000)	-0.018 (0.225)
<i>YEAR19=YEAR21</i>	-0.046*** (0.000)	-0.049*** (0.000)	-0.038** (0.011)

1. 括號內為 p-value，***、**、*表示 1%、5%、10%雙尾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請見表 2。

表 4 為盈餘管理程度之分析²⁶，由表 4 Panel A 第一欄的實證結果可知，*YEAR19* 與 *YEAR20* 係數皆顯著為正 (*YEAR19*=0.023、*YEAR20*=0.019，皆達 1%顯著水準，但 *YEAR20* 係數小於 *YEAR19*)，而 *YEAR21* 係數顯著為負 (*YEAR21*=-0.006，達 1%

²⁶ 本文另將前一期的裁決性應計數加入模型(3)，重新執行迴歸，實證結果未有重大改變。

顯著水準)，代表平均而言，相對於 2018 年，疫情期間盈餘管理程度呈現先升高再降低的趨勢，分別支持假說 H2a 與 H2b。這些結果代表隨著疫情的擴散，邊境管制與各國封廠封城措施，影響了會計師查核工作之執行，使公司獲得較多的盈餘管理機會而使盈餘管理程度提高，在疫情影響的第一與第二年尤為顯著，但第二年的盈餘管理幅度較第一年底，而在疫情影響的第三年，會計師查核工作受限的情況顯著改善，而限制了企業盈餘管理的機會。另外就有無海外子公司的子樣本來看，有海外子公司樣本的 $YEAR19$ 係數顯著為正 ($YEAR19=0.023$ ，達 1% 顯著水準)，而無海外子公司樣本的 $YEAR19$ 係數不顯著 ($YEAR19=0.012$ ，未達顯著水準)，支持假說 H2c。這個結果說明了海外子公司造成的營運複雜度讓企業在疫情期間較有機會從事盈餘管理，而因臺灣皆處於疫情控制良好的狀態，營運活動僅在本土的企業，會計師可順利執行查核程序，因此本土企業較少有盈餘管理機會，此結果值得主管機關、會計師與企業之管理當局注意。

本文另檢定年度別虛擬變數 ($YEAR19$ 、 $YEAR20$ 、 $YEAR21$) 間之差異，彙總結果如表 4 Panel B。就有無海外子公司的兩組子樣本而言，年度別虛擬變數之差異 $YEAR19$ 與 $YEAR20$ 間並無顯著差異 (有海外子公司樣本 $YEAR20-YEAR19=-0.003$ ，無海外子公司樣本 $YEAR20-YEAR19=-0.009$ ， p -value 均大於 0.10)，但 $YEAR20$ 與 $YEAR21$ 間及 $YEAR19$ 與 $YEAR21$ 間均顯著為負 (有海外子公司樣本 $YEAR21-YEAR20=-0.023$ ， $YEAR21-YEAR19=-0.026$ ，無海外子公司樣本 $YEAR21-YEAR19=-0.034$ ， p -value 均小於 0.01，而無海外子公司樣本 $YEAR21-YEAR20=-0.025$ ， p -value 小於 0.05)，顯示兩組子樣本的盈餘管理程度皆隨疫情期間拉長而逐漸降低，意味著事務所遠距查核能力的提升有效限制了企業的盈餘操弄。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知，平均而言，台灣地區企業於疫情期間的查核期間呈現先拉長再縮短的現象，反映了查核工作的投入先增加而後減少，同時財務報表及時性則是先降後升的現象，而盈餘管理程度則是先提高再降低，分別反映了審計工作的投入面及產出面面臨整體環境變化，呈現隨疫情進展而逐年變化的情形，而前述現象在有海外子公司的企業更為顯著。然而，無論有無海外子公司，企業的查核期間在疫情期間皆逐漸縮短、財務報表的及時性皆逐漸提升，而盈餘管理程度則都逐漸改善。對投資人而言，前述結果意味著當總體環境有所變動時，須考慮總體環境因素與個別企業特質間的關聯性高低，留意總體環境因素導致企業財務報表的有用性在短期內降低的可能性，作投資決策時亦應參考財務報表以外的資訊。對監理機關而言，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的變化隨疫情期間拉長及企業有無海外子公司而不同，意味著應採取因時因對象制宜的監管手段，以有效提高監督效率。另外，隨著疫情進行、查核期間逐漸縮短與盈餘管理程度逐漸降低的實證結果，顯示了會計師事務所已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審計準則制訂單位及監理機關應對此有所認知，將遠距查核相關規範加入經常性查核程序，鼓勵查核人員因時制宜、並用傳統實地查核與遠距查核方法，更有效的蒐集查核證據，進而改善查核工作效率。

表 4 盈餘管理程度分析

Panel A：迴歸結果			
	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i>FSUB</i> =1)	無海外子公司 (<i>FSUB</i> =0)
Intercept	0.009 (0.519)	0.004 (0.796)	0.006 (0.937)
<i>YEAR</i> 19	0.023*** (0.000)	0.023*** (0.000)	0.012 (0.319)
<i>YEAR</i> 20	0.019*** (0.000)	0.020*** (0.000)	0.003 (0.829)
<i>YEAR</i> 21	-0.006* (0.085)	-0.003 (0.254)	-0.022* (0.073)
<i>FSUB</i>	-0.014*** (0.001)		
<i>LNTA</i>	0.005*** (0.000)	0.004*** (0.000)	0.007 (0.151)
<i>LEV</i>	-0.048*** (0.000)	-0.053*** (0.000)	-0.033 (0.192)
<i>LOSS</i>	-0.096*** (0.000)	-0.096*** (0.000)	-0.100*** (0.000)
<i>CFOTA</i>	-0.778*** (0.000)	-0.721*** (0.000)	-0.995*** (0.000)
<i>GROWTH</i>	0.021*** (0.002)	0.013*** (0.000)	0.038*** (0.000)
<i>MB</i>	0.001 (0.118)	0.001* (0.072)	0.006** (0.020)
<i>BIG</i> 4	-0.006 (0.192)	-0.008** (0.024)	0.007 (0.548)
<i>GC</i>	-0.084*** (0.000)	-0.101*** (0.000)	0.014 (0.735)
<i>TENURE</i>	-0.000 (0.658)	0.000 (0.630)	-0.000 (0.390)
Observations	5,943	4,953	990
Adj R-squared	40.5%	44.6%	37.1%

表 4 盈餘管理程度分析 (續)

Panel B: 年度虛擬變數差異檢定結果			
	全樣本	有海外子公司 (<i>FSUB</i> =1)	無海外子公司 (<i>FSUB</i> =0)
<i>YEAR</i> 19= <i>YEAR</i> 20	-0.004 (0.123)	-0.003 (0.316)	-0.009 (0.431)
<i>YEAR</i> 20= <i>YEAR</i> 21	-0.025*** (0.000)	-0.023*** (0.000)	-0.025** (0.040)
<i>YEAR</i> 19= <i>YEAR</i> 21	-0.029*** (0.000)	-0.026*** (0.000)	-0.034*** (0.005)

1. 括號內為 p-value, ***, **, * 表示 1%、5%、10% 雙尾顯著水準。
2. 變數定義請見表 2。

(二)額外分析

1. 事務所員工確診

本文推論並發現疫情期間，會計師事務所過往以實地查核為主的查核工作受到各國邊境管制與封廠封城的影響，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然而，隨著事務所的遠距查核能力提升，前述負面影響被正面回應所抵銷。然而，事務所員工確診而使同所員工同受匡列，會計師事務所在疫情下發展的查核模式，可能受到人力緊縮，進一步加重疫情對查核工作的負面影響。因此本節擬探討疫情期間事務所員工確診造成之查核人力短缺是否影響查核工作。儘管在 2019 年至 2021 年年報之查核期間，臺灣皆處於疫情控制良好的階段，但 2022 年 2 月仍傳出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所有員工確診，總計匡列 443 人（中央通訊社，2022）。由於被匡列者必須在家隔離、無法親至查帳地點，可能影響審計工作的進行。然而，2022 年已是疫情爆發後的第三年，事務所於遠距查帳已累積相當經驗。因此，員工被匡列是否對審計工作造成影響有待實證結果驗證。本文擬於額外分析探討員工因疫情被匡列是否影響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本節之分析將樣本依是否由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分為兩組子樣本，重新執行模型(1)及模型(3)。表 5 Panel A 的實證結果顯示，在控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差異下，非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之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縮短，但此現象未發生在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 (*DT*=1 之 *YEAR*21=-0.001，但未達顯著水準，而 *DT*=0 之 *YEAR*21=-0.035，達 1% 顯著水準)。考慮受查客戶是否有海外子公司的條件下，發現不管有無海外子公司，非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之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均顯著較 2018 年縮短 (*FSUB*=1 時 *YEAR*21=-0.035，達 1% 顯著水準，*FSUB*=0 時 *YEAR*21=-0.039，達 5% 顯著水準)，但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的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均未較 2018 年縮短 (*FSUB*=1 時 *YEAR*21=-0.002，*FSUB*=0 時 *YEAR*21=0.008，但均未達顯著水準)，這個結果說明了事務所員工確診確實對於整體事務所之查核期間產生影響²⁷。

²⁷ 本文另將裁決性應計數加入實證模型，重新執行迴歸，實證結果未有重大改變。

另一方面，Panel B 盈餘管理程度的分析中， $DT=1$ 時 $YEAR21=-0.014$ ，達 1% 顯著水準，而 $DT=0$ 時 $YEAR21=-0.002$ ，但未達顯著水準。換言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其 2021 年之盈餘管理程度顯著較 2018 年低，但此現象未發生在非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考慮受查客戶是否有海外子公司的條件下，發現不管有無海外子公司，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之 2021 年盈餘管理程度均顯著較 2018 年降低 ($FSUB=1$ 時 $YEAR21=-0.009$ ， $FSUB=0$ 時 $YEAR21=-0.045$ ，均達 1% 顯著水準)，但非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的 2021 年年報盈餘管程度均未較 2018 年降低 ($FSUB=1$ 時 $YEAR21=0.000$ ， $FSUB=0$ 時 $YEAR21=-0.011$ ，但均未達顯著水準)。綜合來看，事務所員工確診及被匡列可能影響事務所查核時間的安排，但並未損及事務所查核抑止盈餘管理的效益。

表 5 事務所員工確診之分析

Panel A：查核期間之分析						
	$DT=1$	$DT=0$	$DT=1$ & $FSUB=1$	$DT=0$ & $FSUB=1$	$DT=1$ & $FSUB=0$	$DT=0$ & $FSUB=0$
Intercept	4.614*** (0.000)	4.515*** (0.000)	4.663*** (0.000)	4.592*** (0.000)	4.925*** (0.000)	4.354*** (0.000)
YEAR19	0.040*** (0.000)	0.014* (0.052)	0.041*** (0.000)	0.018** (0.020)	0.042 (0.112)	0.001 (0.941)
YEAR20	0.024** (0.017)	-0.014* (0.051)	0.027** (0.010)	-0.013 (0.101)	-0.003 (0.916)	-0.014 (0.446)
YEAR21	-0.001 (0.908)	-0.035*** (0.000)	-0.002 (0.866)	-0.035*** (0.000)	0.008 (0.748)	-0.039** (0.028)
LNTA	-0.022*** (0.000)	-0.011*** (0.000)	-0.018*** (0.000)	-0.011*** (0.000)	-0.064*** (0.000)	-0.003 (0.703)
LEV	0.050 (0.110)	0.111*** (0.000)	0.024 (0.477)	0.105*** (0.000)	0.245*** (0.010)	0.130*** (0.005)
ARINV	0.113*** (0.000)	-0.028* (0.082)	0.118*** (0.000)	0.003 (0.888)	0.142** (0.046)	-0.125*** (0.001)
LOSS	0.017 (0.179)	0.015* (0.092)	0.024* (0.078)	0.019* (0.056)	-0.020 (0.555)	-0.003 (0.891)
CFOTA	-0.183*** (0.000)	-0.065** (0.043)	-0.226*** (0.000)	-0.097*** (0.009)	0.066 (0.591)	-0.002 (0.973)
ROA	-0.016 (0.830)	-0.137*** (0.003)	-0.059 (0.479)	-0.140*** (0.007)	0.310 (0.106)	-0.152 (0.187)

表 5 事務所員工確診之分析 (續)

	<i>DT=1</i>	<i>DT=0</i>	<i>DT=1 & FSUB=1</i>	<i>DT=0 & FSUB=1</i>	<i>DT=1 & FSUB=0</i>	<i>DT=0 & FSUB=0</i>
<i>MB</i>	-0.011*** (0.000)	-0.017*** (0.000)	-0.011*** (0.000)	-0.015*** (0.000)	-0.012 (0.219)	-0.029*** (0.000)
<i>LNAGE</i>	0.023*** (0.004)	0.029*** (0.000)	0.010 (0.217)	0.033*** (0.000)	0.129*** (0.000)	0.015 (0.399)
<i>ISSUE</i>	0.004 (0.627)	0.009 (0.165)	0.001 (0.930)	0.007 (0.290)	0.058** (0.026)	0.018 (0.282)
<i>BIG4</i>		-0.040*** (0.000)		-0.035*** (0.000)		-0.072*** (0.000)
<i>GC</i>	0.086 (0.111)	0.062** (0.032)	0.048 (0.520)	0.036 (0.259)	0.116 (0.171)	0.105 (0.143)
<i>TENURE</i>	-0.000 (0.850)	-0.001** (0.049)	0.000 (0.658)	-0.001** (0.011)	-0.001 (0.325)	0.000 (0.748)
<i>FSUB</i>	0.083*** (0.000)	0.055*** (0.000)				
<i>LIQ</i>	0.000 (0.100)	-0.000 (0.163)	0.000 (0.327)	-0.000 (0.823)	0.000** (0.016)	-0.000 (0.160)
<i>ΔEPS</i>	0.000 (0.789)	0.001** (0.026)	0.000 (0.623)	0.000* (0.084)	-0.000 (0.898)	0.001 (0.256)
<i>ZSCORE</i>	-0.003*** (0.000)	0.001** (0.043)	-0.003*** (0.000)	0.000 (0.560)	-0.003 (0.374)	0.002** (0.013)
Observations	2,328	4,212	2,039	3,390	289	822
Adj R-squared	17.5%	13.7%	16.8%	13.4%	27.8%	16.4%

Panel B：盈餘管理程度之分析

	<i>DT=1</i>	<i>DT=0</i>	<i>DT=1 & FSUB=1</i>	<i>DT=0 & FSUB=1</i>	<i>DT=1 & FSUB=0</i>	<i>DT=0 & FSUB=0</i>
Intercept	0.018 (0.411)	0.007 (0.729)	0.002 (0.903)	0.002 (0.917)	0.081 (0.498)	-0.029 (0.753)
<i>YEAR19</i>	0.014*** (0.001)	0.028*** (0.000)	0.018*** (0.000)	0.027*** (0.000)	-0.005 (0.808)	0.018 (0.222)
<i>YEAR20</i>	0.013*** (0.002)	0.022*** (0.000)	0.018*** (0.000)	0.021*** (0.000)	-0.011 (0.577)	0.011 (0.456)

表 5 事務所員工確診之分析 (續)

	<i>DT</i> =1	<i>DT</i> =0	<i>DT</i> =1 & <i>FSUB</i> =1	<i>DT</i> =0 & <i>FSUB</i> =1	<i>DT</i> =1 & <i>FSUB</i> =0	<i>DT</i> =0 & <i>FSUB</i> =0
<i>YEAR21</i>	-0.014*** (0.001)	-0.002 (0.678)	-0.009** (0.026)	0.000 (0.973)	-0.045** (0.023)	-0.011 (0.467)
<i>FSUB</i>	-0.008* (0.075)	-0.015*** (0.000)				
<i>LNTA</i>	0.005*** (0.000)	0.004*** (0.000)	0.006*** (0.000)	0.003** (0.011)	-0.002 (0.779)	0.011* (0.081)
<i>LEV</i>	-0.060*** (0.000)	-0.038*** (0.000)	-0.072*** (0.000)	-0.036*** (0.000)	0.020 (0.669)	-0.051* (0.085)
<i>LOSS</i>	-0.085*** (0.000)	-0.103*** (0.000)	-0.084*** (0.000)	-0.101*** (0.000)	-0.091*** (0.000)	-0.107*** (0.000)
<i>CFOTA</i>	-0.782*** (0.000)	-0.783*** (0.000)	-0.763*** (0.000)	-0.709*** (0.000)	-0.970*** (0.000)	-1.032*** (0.000)
<i>GROWTH</i>	0.014*** (0.002)	0.024*** (0.000)	0.027*** (0.000)	0.010*** (0.003)	-0.047*** (0.005)	0.052*** (0.000)
<i>MB</i>	0.005*** (0.000)	-0.000 (0.906)	0.003*** (0.000)	-0.000 (0.743)	0.015*** (0.003)	0.006* (0.066)
<i>GC</i>	-0.014 (0.529)	-0.094*** (0.000)	-0.016 (0.578)	-0.099*** (0.000)	-0.085 (0.147)	0.012 (0.838)
<i>TENURE</i>	-0.000 (0.850)	-0.000 (0.520)	-0.000 (0.225)	0.000 (0.429)	0.000 (0.920)	-0.001 (0.132)
Observations	2,110	3,833	1,853	3,100	257	733
Adj R-squared	47.9%	38.6%	54.1%	41.4%	37.5%	39.0%

1. 括號內為 p-value, ***, **, * 表示 1%、5%、10% 雙尾顯著水準。
 2. *DT*=1 表示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擔任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FSUB*=1 表示有海外子公司。其餘變數定義請見表 2。

2. 考慮審計公費對查核期間之影響

Hay et al. (2006)指出查核期間反映了審計工作效率,較長的查核期間意味著在查核過程中碰到難解的審計議題或財務報表本身具有較高的複雜度,因此預期查核期間與審計公費間存有正向關聯性。因此,本文另參考 Lai (2019)將審計公費取自然對數作為控制變數 (*LNAF*) 加入查核期間之實證模型,但於本文寫作期間,2021 年的公費資訊尚未完整揭露。因此,本文刪除 2021 年樣本重新執行模型(1),作為額外測試。未列表結果顯示,審計公費 (*LNAF*) 之平均數為 8.014,中位數為 8.006。全樣本的 *YEAR19* 係數顯著為正,仍然支持假說 H1a, *YEAR20* 係數不顯著,仍然支持假說 H1b。有海外子公司樣本的 *YEAR19* 係數顯著為正,而無海外子公司樣本的

YEAR19 係數不顯著，仍然支持假說 H1c。兩組子樣本的 YEAR20 係數均不顯著，仍然支持假說 H1b。

伍、結論與建議

2020 年起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廣泛蔓延，至今仍對全球企業營運、世界供應鏈運作與人民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會計師審計工作亦可能受到客戶風險變化、邊境管制與各國封廠封城導致查核程序無法執行等問題之影響。許多文獻指出可能的影響但未有較多的實證結果加以論證。

本文以臺灣 2018 年到 2021 年之年報查核進行分析，檢視會計師是否受到疫情影響，延長查核報表的期間，以及在疫情下，企業財務報表之盈餘管理程度是否有顯著變化。實證結果顯示，平均而言，臺灣上市櫃公司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長，而疫情後期 2021 年年報查核期間顯著較 2018 年短，代表疫情初期，審計工作確實受到疫情影響而延長查核期間，但隨著會計師事務所遠距查核經驗的累積，並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疫情後期 2021 年年報的查核期間反而縮短。而疫情初期 2019 年年報查核期間的延遲，在設有海外子公司之受查客戶樣本較顯著，與邊境管制導致無法到國外實地查核之狀況相符。

另一方面，相對於未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在疫情期間盈餘管理程度顯著先增加後減少。代表會計師事務所於疫情初期過後已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以致後續期間的查核期間並未顯著長於疫情爆發前，亦對設有海外子公司之企業盈餘管理行為產生抑止效果。未來無論疫情是否趨緩，主管機關與從事審計工作之查核人員都應該注意此一狀況，避免設有海外子公司企業從事盈餘操弄。

實證結果顯示，平均而言，台灣地區企業於疫情期間的查核期間呈現先拉長再縮短的現象，反映了查核工作的投入先增加而後減少，同時財務報表及時性則是先降後升的現象，而盈餘管理程度則是先提高再降低，而前述現象在有海外子公司的企業更為顯著。然而，無論有無海外子公司，企業的查核期間在疫情期間皆逐漸縮短、財務報表的及時性皆逐漸提升，而盈餘管理程度則都逐漸改善。對投資人而言，前述結果意味著當總體環境有所變動時，也會對企業財務報表與會計師查核工作產生影響，同時該影響受到總體環境因素與個別企業特質間的關聯性高低而有所不同。投資人應留意總體環境因素導致企業財務報表之有用性在短期內降低的可能性，作投資決策時亦應參考財務報表以外的資訊。對監理機關而言，查核期間及盈餘管理程度的變化隨疫情期間拉長及企業有無海外子公司而不同，意味著應採取因時因對象制宜的監管手段，以有效提高監督效率。另外，隨著疫情進行、查核期間逐漸縮短與盈餘管理程度逐漸降低的實證結果，顯示了會計師事務所已發展在疫情下的查核策略，審計準則制訂單位及監理機關應對此有所認知，將遠距查核相關規範加入

經常性查核程序，鼓勵查核人員因時制宜、並用傳統實地查核與遠距查核方法，更有效的蒐集查核證據，進而改善查核工作效率。

本文討論疫情後臺灣上市櫃公司查核期間是否延長，唯金管會於 2020 年 8 月公布公司治理 3.0，其中包含自 2022 年起，分三階段要求公司提前於年度結束後 75 天公布自結財務報表。儘管本文樣本期間僅至 2021 年年度財務報表之揭露，但無法排除上市櫃公司受到金管會即將施行之政策影響，提前準備因應，導致 2021 年財報查核期間顯著縮短之影響。其次，由於在樣本期間，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記者會與報章媒體之報導，僅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在年報查核期間有員工確診，因此本文僅能就比較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2021 年年報簽證期間與其他年度是否有所差異，因此確診員工影響之分析亦可能受到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對於審計工作之特別考量而有所偏誤。此外，由於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中並未標記上市櫃公司之重要子公司之資訊，因此本文僅能就報表中是否揭露權益法投資之海外子公司進行分組分析，未來研究者可手工收集更詳細之資訊，包含子公司所在地之疫情發展等，則可更進一步瞭解疫情對於審計工作之影響。未來研究亦可參考過往文獻 (Rajgopal et al., 2021)，以不同審計品質的衡量指標進行分析，並比較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不同審計品質指標之影響。

參考文獻

- 工商時報，2020a，審計師解禁前不回陸，四大：皆採遠距辦公，2月28日，引用自：<https://ctee.com.tw/news/tax-law/227180.html>。
- 工商時報，2020b，KPMG 遠距工作系統將上線，3月4日，引用自：<https://ctee.com.tw/news/policy/229189.html>。
- 中央通訊社，2022，勤業眾信員工確診匡列443人，居隔176人採陰解隔，2月15日，引用自：<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202150259.aspx>。
- 中時新聞網，2022，403員工居隔，勤業：服務不受影響，2月10日，引用自：<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210000426-260511?chdtv>。
-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21，安永強化防措施，已投保防疫險，保障看顧員工健康，6月16日。引用自：https://www.ey.com/zh_tw/news/2021/06/ey-taiwan-news-release-2021-06-16?fbclid=IwAR1xR15jsYOMt__39qrOae9J0dM9G_gJCW2alCFx2MI9AVrLhcldxC3ioqk。
- 余至浩，2020，居家辦公實例：KPMG 安侯建業行動辦公室全程串到家，千人外勤遠距查帳不用出門，引用自：<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6897>。
- 林有志、黃勁彥、辛宥呈與施志成，2007，我國上市公司半年報申報時間落差特性之研究，當代會計，第8卷第1期：85-112。
- 林嬋娟與郭頌君，2020，查核資料分析之發展及應用—以臺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為例，會計審計論叢，第10卷第2期：1-29。
- 范宏書、林彥廷與陳慶隆，2013，財務會計準則第35號公報與財務報表公佈時效性，臺大管理論叢，第23卷第2期：97-132。
- 陳俞如、金成隆與謝存瑞，2009，海外投資與盈餘品質：資訊不對稱觀點，管理學報，第26卷第4期：353-376。
- 黃曉雯，2020，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查核實務—專訪審計準則委員會主委徐永堅，會計研究月刊，第415期：65。
-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2020，數位技能提升，企業抗疫刻不容緩，3月19日，引用自：<https://www.pwc.tw/zh/news/press-release/press-20200319-1.html>。
- 廖秀梅與廖益興，2002，會計師更換時機對年報揭露時效及資本市場之影響，當代會計，第3卷第2期：242-265。
- Accountancy Europe. 2020. *Coronavirus crisis: Implications on reporting and audit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ountancyeurope.eu/publications/coronavirus-crisis-implications-on-reporting-and-auditing/> (Accessed October 30, 2022).

- Albitar, K., A. M. Gerged, H. Kikhia, and K. Hussainey. 2021. Auditing in times of social distancing: The effect of COVID-19 on auditing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9 (1): 169-178.
- Ali, H., H. M. G. Amin, D. Mostafa, and E. K. A. Mohamed. 2022.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G-12 countries.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775-797.
- Altman, E. I. 1968. Financial ratios,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3 (4): 589-609.
- Appelbaum, D., S. Budnik, and M. Vasarhelyi. 2020.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crisis. *The CPA Journal* 90 (6): 14-19.
- Bauer, T. D., K. A. Humphreys, and K. T. Trotman. 2022. Group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in auditing: Research in the time of COVID-19 and beyond.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41 (1): 3-23.
- Beaver, W., P. Kettler, and M. Scholes. 197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rket determined and accounting determined risk measur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45 (4): 654-682.
- Becker, C. L., M. L. DeFond, J. Jiambalvo, and K. R. Subramanyam. 1998.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5 (1): 1-24.
- Bedard, J. C., R. Hoitash, U. Hoitash, and K. Westermann. 2012. Material weakness remediation and earnings quality: A detailed examination by type of control deficiency.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1 (1): 57-78.
- Blankley, A. I., D. N. Hurtt, and J. E. MacGregor.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report lags and future restatement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3 (2): 27-57.
- Bliss, M. A. 2011. Does CEO duality constrain board independence? Some evidence from audit pricing. *Accounting & Finance* 51 (2): 361-380.
- Bowrin, A. R., and J. King. 2010. Time pressure, task complexity, and audit effectiveness.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5 (2): 160-181.
- Bryan, D. B., and T. W. Mason. 2020. Earnings volatility and audit report lag. *Advances in Accounting* 51: 100496.
- Burgstahler, D., and I. Dichev. 1997.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 (1): 99-126.

- Bushman, R., Q. Chen, E. Engel, and A. Smith. 2004.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7 (2): 167-201.
- Chen, C. Y., C. J. Lin, and Y. C. Lin. 2008. Audit partner tenure, audit firm tenure,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oes long auditor tenure impair earnings quality?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5 (2): 415-445.
- Chi, W., L. A. Myers, T. C. Omer, and H. Xie. 2017. The effects of audit partner pre-client and client-specific experience on audit quality and on perceptions of audit quality.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2: 361-391.
- Dao, M., and T. Pham. 2014. Audit tenure, auditor specialization and audit report lag.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9 (6): 490-512.
- Dechow, P. M., R. G. Sloan, and A. P. Sweeney.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70 (2): 193-225.
- Demirkan, S., S. Radhakrishnan, and O. Urcan. 2012. Discretionary accruals quality, cost of capital, and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27 (4): 496-526.
- Durand, G. 2019. The determinants of audit report lag: A meta-analysis.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4 (1): 44-75.
- Francis, J. R., E. L. Maydew, and H. C. Sparks. 1999. The role of Big 6 auditors in the credible reporting of accrual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8 (2): 17-34.
- Francis, J. R., and J. Krishnan. 1999. Accounting accruals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 (1): 135-165.
- Habib, A., M. B. U. Bhuiyan, H. J. Huang, and M. S. Miah. 2019. Determinants of audit report lag: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3 (1): 20-44.
- Hategan, C. D., R. I. Pitorac, and A. C. Crucean. 2022.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auditors'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listed companies on key audit matters.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886-907.
- Hay, D. 2013. Further evidence from meta-analysis of audit fe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17 (2): 162-176.
- Hay, D. C., W. R. Knechel, and N. Wong. 2006. Audit fees: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upply and demand attribute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3 (1): 141-191.

- Hay, D., K. Shires, and D. Van Dyk. 2021. Auditing in the time of COVID-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auditing in New Zealand and subsequent reforms. *Pacific Accounting Review* 33 (2): 179-188.
- Hegazy, M. A. A., R. El-Haddad, and N. M. Kamareldawla. 2022. Impact of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and Covid-19 pandemic on KAMs reporting.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908-933.
- Hu, F., S. Yang, and D. E. Giacomino. 2010.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operations and their disclosure on earnings qual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9 (3): 109-120.
- Kend, M., and L. A. Nguyen. 2022. Key audit risks and audit procedures during the initial yea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analysis of audit reports 2019-2020.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798-818.
- Khombe, M. 2014. *A desk study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using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Exampl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 supply and demand in Malawi*. Unpublished Thesi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5365&context=etd> (Last accessed March 12, 2023).
- Knechel, W. R., and D. S. Sharma. 2012. Auditor-provided nonaudit services and audit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pre- and post-SOX audit report lag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1 (4): 85-114.
- Knechel, W. R., and J. L. Payne. 2001. Additional evidence on audit report lag.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 (1): 137-146.
- Knechel, W. R., D. S. Sharma, and V. D. Sharma. 2012. Non-audit service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New Zealand.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39 (1-2): 60-81.
- Kothari, S. P., A. J. Leone, and C. E. Wasley. 2005.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9 (1): 163-197.
- Lai, K. W. 2019. Audit report lag, audit fees, and audit quality following an audit firm merger: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 36: 100271.
- Lee, K. W., B. Lev, and G. Yeo. 2007.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22 (2): 293-331.

- Levy, H. B. 2020.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ing implicatio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ome practical guidance. *The CPA Journal* 90 (5): 26-33.
- Liu, G., and J. Sun. 2022.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he value relevance of earnings: US evidence.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850-868.
- Management Study Guide. 2012. *Desk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echniques*. Available at: <http://www.managementstudyguide.com/desk-research.htm>.
- McVay, S. E. 2006.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1 (3): 501-531.
- Mehnaz, L., A. Rahman, and H. Kabir. 2022. Relevance of supplementary fair value disclosures under market uncertainty: Effects on audit fees and investors' pricing.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819-849.
- Mitra, S., H. Song, and J. S. Yang. 2015. The effect of Auditing Standard No. 5 on audit report lags. *Accounting Horizons* 29 (3): 507-527.
- Rajgopal, S., S. Srinivasan, and X. Zheng. 2021. Measuring audit quality.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6 (2): 559-619.
- Roychowdhury, S. 2006.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2 (3): 335-370.
- Sharma, D. S., P. N. Tanyi, and B. A. Litt. 2017. Costs of mandatory periodic audit partner rotation: Evidence from audit fees and audit timelines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36 (1): 129-149.
- Sharma, N., G. Sharma, M. Joshi, and S. Sharma. 2022. Lessons from leveraging technology in auditing during COVID-19: An emerging economy perspective.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37 (7): 869-885.
- Simunic, D. A. 1980.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8 (1): 161-190.
- Skinner, D. J., and R. G. Sloan. 2002. Earnings surprises, growth expectations, and stock returns or don't let an earnings torpedo sink your portfolio.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7: 289-312.
- Stewart, J., P. Kent, and J. Routledge. 201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partner rotation and audit fe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Australian market.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5 (1): 181-197.

- Sultana, N., H. Singh, and J. L. W. M. Van der Zahn. 2015.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audit report la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19 (2): 72-87.
- Tanyi, P., K. Raghunandan, and A. Barua. 2010. Audit report lags afte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auditor changes. *Accounting Horizons* 24 (4): 671-688.
- Taylor, D., I. S. Awuye, and E. Y. Cudjoe. 2023. Covid-19 pandemic, a catalyst for aggressive earnings management by bank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42 (1): 107032.
- Watts, R. L., and J. L. Zimmerman. 1978.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Accounting Review* 53 (1): 112-134.
- Wu, T. C., H. W. Huang, C. C. Yu, and C. H. Wu. 2020. Engagement partners participating in auditing standard setting and audit quali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7 (5): 591-611.
- Xu, Y., E. Carson, N. Fargher, and L. Jiang. 2013. Responses by Australian auditors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ccounting & Finance* 53 (1): 301-338.

